



第 1 章 公共经济学导论

§ 1.1 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政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政策实施的强有力工具（如税收、支出、借款、管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中每一个人与企业的经济生活，影响着消费者、工人、储户、借款者、雇主与生产者的经济行为。显而易见，无论是在民众之中还是在经济学界，伴随着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不断增大，关于政府活动恰当范围界定的争论正日益激化。基于此，本书的目的是讨论经济分析的一般工具应当如何（或已经）有效地运用于分析公共政策实施的某些重要方面。

在详细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政策作用之前，我们将在本章中给出本书要研究问题的简要轮廓以及将要分析的一些主要问题。从表面上看，我们将研究的起点定位在对一个没有任何公共部门的纯粹市场经济的运行分析之上，似乎存在一定的矛盾，之所以这样做，部分理由在于复习经济学居民与厂商理论的基本原则。然而，更主要的原因是，所有拥有现代经济学知识背景的读者都会同意，经济学家最关心的是社会的稀缺资源应当如何通过一个分散化的市场机制得到配置，而且已经证明，除某些特定的情况外，资源的

市场化配置将会达到经济“福利”的最大化。更确切地说，竞争性市场的配置结果是有“效率”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给效率以确切的定义，在这里不妨先将效率视同于一种绝大多数人民都认为是相当可行的状态。市场即效率的理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那里，这一观点并在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历史辩论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显然，我们也希望这一观点在我们以下的分析中起到同样的作用。在第 2 章中，我们将要详细分析市场是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的，而一旦对此达成共识，我们将自然地转入第二个问题，即为什么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市场无法解决社会的所有经济问题。

对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回答：

其一，我们将会发现，市场必有效率的结论只有在某些特定前提下才成立，而这些前提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首先将详细地描述在理想条件下市场有效运行的基本情况，而后我们将在第 3 章中讨论所谓“市场失灵”问题，即研究在什么条件下市场效率可能不复存在。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分析一种非市场框架以求得市场效率的实现，而这种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给出政府干预经济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其二，即便我们承认资源的有效配置是重要的，但这并不是经济活动的惟一准则。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效率并不能保证经济福利在社会成员中的公平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个人或家庭福利的获取，既取决于其赖以获得收入的对稀缺资源的所有权，又取决于其所购买商品的价格。不同家庭所拥有稀缺资源的不同价值隐含着一种内在的不公平性，而这种不公平意味着家庭在消费机会上的差异。某些家庭可能拥有较多的自然禀赋，从而拥有较多的满足自身需求的机会，而另一些家庭所处的境况则差得多。显而易见，对这种由于市场导致福利的不公平分配进行干预从而实行较公平的分配格局是合意的。这就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第二个一般标准。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经济分析可以用于描述收入分配是如何确定的，及用于考察政府政策是如何影响个人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但这一分析本身并不能确切地判定这一结果究竟是否公平。从本质上说，对公平的判定并非经济学所能解决的，这完全取决于道德与伦理上的判断。

从以上基点出发，我们就可以考察不同的政府活动，可以力求确定这些政策是否有助于为社会实现一个更为有效与更为公平的经济结果。当然，我们也遗憾地指出，由于存在着互为冲突的政策目标，任何政策的实行都会产生众多的问题，因此必须进行必要的权衡。

§ 1.2 政府支出、外在性与价格政策

在本书的第 2 篇中，我们将具体分析第 3 章所论及的市场失灵导致的各种问题。假定我们相信这样一个命题，即完全自由的市场无法提供公路、国防、教育、电力供应及污染治理等产品，那么是否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考

虑呢？

一种可能性是政府可以直接提供这些公共设施。对于市场无法提供的国防与公路这类特定产品而言，政府的直接介入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连市场也无法有效地提供这些产品，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政府提供就一定是有效率的呢？确切地说，究竟应提供多少国防或多少公路才是真正有效率？这类产品的提供能够为社会中的成员带来价值，但对稀缺资源的占用并非就是有效的。因此，必须对这些公共设施的效益与成本进行确切的比较。在第 4 章中，我们将介绍如何进行这方面的比较，即提供有效公共支出应遵循的准则。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失灵都要求政府直接提供商品与劳务。污染就是一个典型的情况，属于我们称之为“外在性”的一个特例。所谓外在性，指的是家庭或厂商的某些行为在市场交易框架之外对他人产生的影响。

机场噪音就是一种外在性。航空公司与它们的顾客、供应商与雇员都有各种各样的市场联系，即它们所提供的商品与劳务产生各类买卖关系。然而，航空公司并未就其所导致的噪音对机场附近的居民提供任何补偿。这里存在着这样一种经济关系：居民因噪音而蒙受损失。但是，如果居民对其房屋上的天空拥有使用权的话，他们将会像雇员因出卖劳力获得补偿一样，对经其上空飞翔的每一架飞机收取噪音费。遗憾的是，并不存在关于噪音的市场，或者说这些噪音外在于市场而存在。

第 5 章阐明的经济理论表明，在存在各类外在性的情况下，市场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常识直观地告诉我们，在机场噪音事例中的宁静，在其他污染事例中的空气与净水，都是在没有市场配置的情况下被无效地耗尽了。事实上，污染制造者（或其他外在性制造者）在已经导致了相当的社会成本时却对此视而不见，并未将此事实纳入他们的经济行为决策过程，其原因就在于不存在这样的市场去迫使他们对这些成本负责。于是，效率损失的出现是不足为奇的。

那么，应该如何解决外在性问题呢？一种可能性是政府对制造外在性的厂商或家庭实行直接的控制：政府接管导致外在性的航空公司、钢铁公司或化工厂的所有权。然而，这种做法将会导致政府对经济生活相当程度的干预，并会带来相当高的其他费用。此外，对于那些能够在市场上以较低成本运作、及时满足消费者需求提供激励机制的好的国有化企业，往往也会以资源的浪费作为代价。

另一种不那么激进的解决方式是影响污染或其他外在性制造者并对由此形成的经济受益与成本进行计算。例如，政府可以针对污染制造者制定环境保护标准。在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实际中，这是一种处理环保问题的常用方法。但是，经济分析已经表明这种管理方法也有不少弊病。经济学家也提出包括对污染者课征矫正税或费用在内的其他政策工具。对于以上各种政策选择，我们将在第 5 章中详加讨论。

公共支出原则与外在性理论对于了解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干预经济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很有启示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获取关于公共

支出最优水平与对外在性最佳控制所必需的各种信息。虽然市场机制能够通过均衡价格的确定来提供关于稀缺资源边际价值的讯号，但对于诸如国防这类公共产品或者诸如污染的外在性，市场却无法准确地提供必要的信息。

那么，应该如何确切地判定一公共产品（如高速公路、堤坝、污水处理场或学校）究竟为社会提供了多少收益或价值呢？一个看上去简易直接的方式就是直接询问公共产品的消费者，这些公共产品对消费者的价值究竟有多大。例如，询问沿河流下游居住的居民究竟因污水处理场的建立而受益多少，询问某一新公路的兴建究竟为使用该路的旅行者节约了多少时间，如此等等。然而，正如我们将要分析的那样，消费者并没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去说真话，去提供那些真实的信息。这是一个十分遗憾的事实，而了解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意味着我们将无法把握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在许多场合下，这一内在缺陷极大地制约了公共支出理论的实用性。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关于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往往并不一定与效率目标挂钩，而且事实上也常常不是这样。政治机构往往涉足于决策过程，并且没有把资源有效配置原则放在首要位置。因此，当政府干预被视为解决某些市场失灵的一种方法时，我们必须对政府政策的实际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必须研究这些实际进程是否有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换言之，我们必须将政府本身也视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而且这一机制同市场一样，也有可能出现“失灵”。然而，对比市场机制而言，我们对这种非市场配置机制的研究还是有限的。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对政府行为的经济研究只有数十年短暂的历史。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已经提出了一些政治决策过程的模型，例如简单公民表决模型，代议制立法模型及政府官僚决定模型等等。在第 5 章中，我们将对这些模型与机构进行考察，并分析其对政府政策决定过程的影响。这些分析将会产生一个重要结论，即政治决策过程充其量只能是对信息收集与有效决策的一个不完全的解决方法。与此同时，我们也将讨论一些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虽然这些方法还未付诸实践，但是它隐含着解决决策问题的较为满意的答案。

当然，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提供公共产品与控制外在性，政府还经营（或至少管理）如能源供应与交通等在内的公共企业。在这类行业中，由于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将会产生某些特殊的问题。在某些条件下，这些问题是与这些行业特定的技术要求相联系的。例如，某些企业只有在相当大的生产规模的条件下才能实行低成本经营，众多小企业参与竞争的竞争性行业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市场力量自由发展，就会形成所谓的“自然垄断”，而这是与对经济效率及公平的考虑格格不入的。因此，必须讨论的问题是解决这种市场失灵的公共政策，而且当政府必须对这类行业加以管制时，应当讨论如何使这些公共企业经营更有效率。我们将在第 7 章中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对公共企业产品的恰当定价问题，是否应当对公共企业进行补贴的问题，以及这类企业适当的生产规模问题。

第 2 篇的最后一章讨论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不论是否源于矫正市场失灵的原因，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已经大量涉足各种支出工程与项目，许多经

济决策已经在公共部门中进行。因此，如何使这些决策变得尽可能有效率是极其重要的。必须指出，在现实中人们已经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试图对政府项目所形成的社会收益与成本进行详尽的比较，使公共决策过程制度化。因此，我们必须讨论成本效益分析的原则，并着重就这一原则在实践中运用时所引发的一些挑战性的问题进行探讨。例如，包括堤坝、高速公路、港口设施与自来水厂在内的许多公共工程的经营期都相当长，应该如何对这类工程所涉及的未来收益与成本流进行必要的评估？再比如，水利灌溉工程是一个风险较大的项目，必须对这类项目的收益作如下研究：如果未来雨量过于充足，这一项目的预期收益就须打折扣；如果农业生产技术变化而导致耕种对象不同从而对供水要求发生变化，这一工程收益也将随之变化；或者如果农民将原耕地挪为他用，则工程之收益将不复存在。我们必须研究的就是如何将这些风险归入项目评估中一并加以讨论，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就是第 8 章要回答的。

§ 1.3 税 收

不论是否可以从纠正市场失灵的角度来加以论证，政府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使用资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 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数量已经急剧上升，这些支出使得原来可以用于私人部门的资源被再配置于政府部门。税收就是这样一种将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至公共部门的主要机制，因此，公共部门经济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税收进行认真的研究分析。

在本书第 3 篇中，我们将用五个章节的篇幅讨论税收的不同侧面。首先在第 9 章中，我们将给出要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并从效率与公平两大方面讨论税收的重要性。令人遗憾的是，在一般条件下税收都会对资源在市场机制下的有效配置产生扭曲作用。例如，个人所得税会降低个人从事工作或储蓄这类获取收入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与企业相关的税收也会深刻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与公司财务决策。税收的激励（或抑制）效应将是第 11 章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 10 章将介绍税收公平方面的几个重要概念。税收对社会福利的分配会产生多重影响，而人们普遍认同这一概念，即税负应在公平与公正的基础上加以分配。但是问题的难度在于如何使这一良好的愿望转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例如，如果我们都认同高收入者应支付较高的税收，那么究竟多高的税率才是公平可取的呢？与此同时，这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将收入作为税基是否符合公平的要求？为什么不能以人们的财富或者消费支出作为税基呢？关于税基选择的争论是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涉及到关于公平考虑的许多方面。

关于公平税负讨论的核心在于社会成员中的实际税负分配问题。所谓实际税负指的是个人所拥有的有价值资源的牺牲，或者进一步说，个人在经济

需求满足或福利方面的损失。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实际税负往往并不刚好等于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移转的税收现金流。让我们以对企业收入的课税为例，这一税负是否一定会降低该企业及其所有者的净收入呢？假定该企业有能力抬高其产品价格或者压低工人工资，在一定的市场条件下，这些做法将可能在牺牲消费者或工人利益的基础上保护其税后的实际收入不会下降。这种实际税负移转的情况对于任何一税种来说都是存在的，因此当我们讨论某一税种的税负时，必须对这种可能的移转量有一确切的了解。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已经对税负移转与实际税负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第 12 章将对此进行详细评价。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税收一般会对市场的有效资源配置产生扭曲作用。然而，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某一类税种也许会比另一类税种产生更大的扭曲或变形效应。这一思考就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假设政府所采纳的是一个混合税制，即可以对工资收入、利息收入、烟酒汽油等特种商品开征不同的税，那么需要研究的是各种不同组合所可能带来的不同变形损失总量，要研究什么税率结构会使效率损失达到最小。这些内容都将在第 9 章中加以讨论。而在第 10 章中我们将涉及与此相联系的公平效率权衡问题。

所谓公平效率权衡指的是，假定我们十分注重经济福利的公平分配问题，假定任一家庭的福利主要源于其收入，那么如果税制对高收入者课征重税，而对低收入者课以轻税，则我们极有可能得到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但是，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通常也将是一个较为贫穷的社会，因为受制于重税的高收入者将不再存在继续工作以增加收入的动力，因此从总体上看，这种倾向将使整个社会趋向贫穷。于是，究竟应当如何在相互矛盾的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中寻求一个平衡点呢？显而易见，答案取决于我们对这两大目标的价值判断。虽然，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无法对这一价值判断作出最后取舍，但是经济分析至少能为这一问题的讨论提供一个系统的框架。

§ 1.4 个人间与政府间的移转

如前所述，政府的一个传统而主要的职能是花费一定资源从而提供各类商品与劳务。相比较而言，政府还有另一个新近发展而日益重要的职能，即将资源从社会中某些个人与团体手中转移到其他个人与团体手中。在本书第 4 篇中，我们将用两章的篇幅分别讨论个人间与政府间的移转问题。

个人间的移转主要通过许多不同的项目计划得以实现，并与不同的政策目标相联系。某些移转项目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穷人。对低收入个人的移转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现金移转或某些特别商品的提供。近年来发展相当快的美国食品提供计划就是实物移转的一个典型事例。其他例子则包括对穷人提供的医疗服务、房租补贴与公屋等等。

显而易见，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是必须研究现金与实物转移究竟在对穷人的效应上有什么不同。除此之外，关于转移项目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应研究这类收入维持项目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穷人通过工作赚取收入的积极性，这一点同前面提及的税制中的效率与公平权衡问题极其相似。近年来，关于福利计划有碍转移获取者工作积极性的命题已经得到相当重视，不少经济学家对此作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第 14 章将讨论这些及其他涉及到转移再分配效应的问题。

在第 13 章中我们也将讨论包括老龄保障、失业保险与公共医疗保险计划在内的各种“社会保险”政策措施。虽然在某些条件下有些项目主要效力于使低收入者受益，但是大多数这类转移的存在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以医疗保险为例，其目的是为了个人不会因疾病而带来经济上的损失。社会保障计划则使受保险者有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收入保证并能预防其他风险。与此相类似，失业保险制度能使工人在因经济波动而暂时或永久性失业时得到一定的补偿。对于所有这些项目计划而言，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了解为什么私营保险或其他安排无法达到公共保险所能实现的目标。

我们也必须考虑这类项目可能带来的某些不利后果。以目前在美国与其他国家覆盖面极广的社会保障计划为例，已经有不少研究表明这类计划导致私人储蓄的下降及提前退休。这些可能的后果已经在经济学家中引起了广泛争议，并值得进一步加以讨论。与此相类似，失业保险被认为会诱使厂商辞退工人并降低失业工人寻找新就业机会的积极性。而就医疗保险而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在医疗保险上的支出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公众对医疗设施的需求，并降低医生与病人节约使用医疗设施的愿望。不少经济学家已经就社会保障项目的这些可能问题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将构成我们讨论的核心。

最后，我们将涉及财政联邦制的问题。在美国与其他许多国家，政府支出与征税权限是由各级政府分别承担的。从经济角度来看，什么是这种联邦制结构的优势或缺陷呢？某些人可能认为，联邦制有利于公共部门在各级政府间的恰当分布，能够给个人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并更灵活地满足个人的需求。然而，国内各区域间人员与商品自由流动的事实可能会使区域间税收与支出政策上的差异对区域间资源配置产生扭曲作用，造成效率损失。此外，政府提供商品与劳务所产生的受益可能有存在跨地区、或有自上而下的“外溢效应”。如果在一定区域内的决策者在提供公共项目时并没有将这种外溢效应考虑在内，由此形成的公共支出决策将是没有效率的。

显然，联邦制在享有许多优势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解决存在问题的方法是实现自上而下的政府间转移。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对州与地方政府提供大量的转移资金，州政府也向地方政府转移不少资源。研究表明，这种政府间的转移能够抵消因区域间外溢效应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并能缓解区域间要素移动所带来的问题。第 14 章将论述日益重要的财政联邦制问题。

§ 1.5 结 论

综上所述，现代公共部门经济学涵盖面极广，所涉及到的对公共政策的经济评估等问题经常是寓意深刻且相当复杂的。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些问题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也还受制于整个理论与实证经济学的发展水平。然而，和其他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分支一样，公共部门经济学目前所处的这一现状是相当正常的。我们能够不断完善这一学科，并且随着公共政策的不断实践而提高我们运用经济分析方法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能力。我们期望本书的读者将能从阅读本书中得到激励，在本书所涉及的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这一学科的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

经济科学译丛·公共部门经济学（第二版）

经济科学译丛·公共部门经济学（第二版）

第 1 篇 公共决策的 理论依据



第 2 章

经济效率与竞争性 价格机制

§ 2.1 导 论

经济机制的目标是配置经济中的稀缺资源用于生产实物产品和服务以满足社会个体的需要。在混合经济中，如美国，依靠两种基本机制来实现这种目的。其一是市场定价机制，通过此种机制，私人厂商对由市场供求水平决定的价格作出反应，并据此从事自利的经济活动。所有在这种市场机制的制约下运行的厂商的集合就称为私营部门。政府，或称之为公共部门通过征税、实物产品和服务的支出、直接对家庭和厂商的货币转移，以及为私营部门的运行制定法规等，也进行资源配置的决策。公共部门的决策行为包含了直接对经济中资源的重要分享以及对私营部门行为的间接影响。^①本书的目的就是分析公共部门如何决策以及这些决策如何最终影响经济中单个家庭的福利。

一个经济可以完全依赖私营部门配置资源，但此情形从未出现过。其原因并不仅仅因为公共部门决策本身带来的好处，而是在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无约束行为带来的恶果。本书的第 1 篇较详细地论述了公共部门行动的原则，该部门是建立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不完善基础之上的。评判私

人市场有效性的前提是必须确立某种标准，据此来评价资源的配置。可应用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经济效率的概念，经济学家通常使用它来评价各种资源配置的优劣及用于制定政策。二是公平的概念，虽然由于下文将会提及的原因，经济学家们很少提及它，但对于公共部门决策者而言，当必须在各种可替换政策之间作出选择时，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以下部分将详细解释这些术语的意义，并将分析通过价格机制达到标准的优点。而当现实阻碍私人市场机制在进行资源配置中达到期望的经济效率和公平时，公共部门的经济行为将是十分有用的。随后的章节将讨论这些情形。

第4节介绍一些重要的方法论概念和用于分析资源配置效率的工具。特别是我们强调使用市场价格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的概念作为衡量资源配置损益的特定途径。这些工具及其与供求曲线的关系将在以后几章中反复运用，以建立公共部门内有效资源配置的标准，以及用于分析公共部门决策如何影响私人市场资源配置有效性。在第5节我们将讨论延伸到考虑了时间因素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代际经济市场的作用。

§ 2.2 帕累托最优的概念

自从亚当·斯密时代起，人们就已经认识到竞争性市场体制作为经济中资源配置机制的好处。事实上，在自由市场中以给定价格自由买卖的自利的个人和厂商被所谓“看不见的手”所引导，从事专业化活动，由此相对于其他人而获得比较优势。在此情形下，所有的参与者都通过在竞争性市场进行自愿交易而获益，而且社会资源的产出价值也获得了最大化。正是在经济效率这一基本概念下，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许多领域与范畴，例如交换利益、比较优势以及经济中产出价值最大化。在本节及下一节，将介绍福利经济学现行理论的概要以及竞争价格机制在有效利用经济资源中所起的作用。

理解现代福利经济学的中心环节是帕累托最优的概念，这一名称得自于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Pareto）的发现。帕累托最优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在此状态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至少不使另一个人处境不变得更坏的基础上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好。就整个经济而言，对可用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是指至少无损于他人福利（即减少其效用）而提高某人福利（或效用）的资源重新配置是不可能的。十分明显，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非常困难，但同时也是人们所希求的。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原因使之通常达不到这种状态。但人们仍喜爱用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来评价未达到最优的人为资源配置状况。如果至少一个人处境变好了，其变动结果又并未使任何人处境变糟，则这种变动就称为帕累托改进。因此，帕累托最优就是帕累托改进不可能发生的状态。

然而，大多数经济变动并不能如上述那样按照帕累托原则来评判，因为在这些变动中一些人处境变好了，可是其他人的处境却变糟了。事实上，这

也许就是福利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困难在于在一种经济变动中一些人获益而另一些人却受损，对此变动是否提高了社会经济福利的评判应涉及获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福利变动比较。也就是说，社会福利是由个人福利加总而成的，因此在评判实际社会福利是否提高或降低之前，每个人在这种变动中都会给个人福利损益带来一定的量的变化。以经济学家自居的人拒绝对这些量的变化作出评判，因为这涉及到某种价值判断，而经济学家宣称对此并非专长。

为避免进行个人福利间的比较，经济学家们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使帕累托原则的应用延伸到这一领域。一条途径是评判一种经济变动并不根据是否达到了一个实际帕累托改进，而是看其是否出现了一个潜在帕累托改进。所谓潜在帕累托改进指的是经济变动中的获益者对受损者提供补偿的同时，仍然可以使自己处境变得更好。如果获益者实际上对受损者提供了补偿，那么每个人的境况都会变得更好，此时的经济变动就是一种潜在的改进。假设补偿检验的概念有一些模棱两可。福利经济学著作对此多有研究，在此只能简要提及其中几个。米桑（Mishan, 1960）及格拉夫（Graaf, 1957）曾对此作详尽研究，争论在于假设补偿支付所采取的形式。卡尔多（Kaldor, 1939），希克斯（Hicks, 1939）及斯托夫斯基（Scitovsky, 1950）认为可采取特定实物转移的方式，萨缪尔森（Samuelson, 1950）则认为可采取一般购买力的转移方式。对于前者而言，补偿支付的过程并不影响实物产品的生产，而后者则会影响。是否满足补偿标准取决于假设支付被准许的方式，然而从状态 1 变动至状态 2 和由状态 2 反向变动至状态 1，可能都满足补偿标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假设补偿检验也是模糊不清的。这种反向变动的可能性即所谓的斯托夫斯基悖论。换句话说，假设补偿检验并不能评判所有的经济变动。

以假设补偿标准的概念作为评价社会福利的一种方法，自然使人联想到将货币作为测量所有个人福利变化的手段，如哈伯格（Harberger, 1971a）所竭力倡导的那样。如果一个人认为其效用变动价值为 1 000 美元，而另一个人则认为是 500 美元，则人们自然会设想前者将对后者补偿并且依然能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经济学家们几乎普遍遵从这种以货币形式来测定个人福利的想法，并且将个人福利变化加总来测定整个社会的福利变化。这种做法的理由是它可以指示出是否满足一个假设补偿检验。^②

还存在一种同样将价值一美元的收益或损失看作对所有个体而言效用都一样的方式，即假设获得最优收入分配的责任在于政治决策制定者。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学家设想，决策者在实施再分配职责的过程中会实际上认定一美元产生的边际效用对所有个体而言是相同的。据此，一个经济变动就可根据净收益的正负来评判。而当任何经济变动都不能带来净收益的变化时就是帕累托最优配置。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经常沿用这种惯常的分析方法，即以一美元的效用对所有个体都是相同的假设来评价社会福利变动。

我们对于帕累托最优概念的兴趣在于它是评判资源配置的规范分析基础。我们也接受这样一种基本的价值判断：即任何帕累托改进的变动都给社

会福利带来了改进。^③ 经济效率的概念直接源于帕累托原则。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被定义为帕累托最优：既使自己的处境改善而同时不使另一人的处境变糟是不可能的。在本书很多部分中，我们将社会所有成员用货币表示的获益和损失加总起来，以这种惯常的测定经济变动福利效果的方式来分析经济效率。当然应当牢记用这种惯常方式来解释社会福利变动时必须接受的前提：由于以上提到的原因，不管一美元的获益发生在谁身上，它带来的效用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样的。

现在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到竞争性价格机制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效率上来。在某种情形下，自由放任条件下的竞争性市场运作带来的资源配置结果将是帕累托最优的。^④ 然而现实并不总是满足竞争性市场的有效性所需的条件，这就为我们思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 2.3 竞争性市场的效率

帕累托最优原则可表现为一些特别的条件，即所谓效率条件，实际经济中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必须满足这些条件。本节关注的是新古典静态经济，在此经济模型中，这些条件将区分为交换效率、生产效率及总体效率条件。这些条件是纯技术条件而不含有制度内容并独立于任何资源配置机制。我们要问的问题是，私人价格机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这些效率条件的要求。可以证明，在一定的生产技术与个人偏好假设条件下，并同时假设私人价格机制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运行，则资源配置将满足这些效率条件。此节中使用的这种经济的抽象模型被用于特别说明竞争性价格机制的效率。在本章第 5 节中，我们将这种分析延伸至代际间经济。

为便于进行图形分析，我们将在二维空间内讨论所有的经济变量，并假设经济有两个个体组成（ A 和 B ），生产两种产品（ X 和 Y ），以及两种基本生产要素（劳动 L 和资本 K ），且后者的供给是固定不变的。问题在于揭示一系列条件，在这些条件下配置劳动和资本用于 X 和 Y 的生产， X 和 Y 则分配给 A 和 B ，并达到以下状态：没有任何其他的生产要素配置和产出分配能使 A 或 B 的福利变得更好而又同时不使另一方的福利变糟。所幸的是，二维空间图形分析的结果可以直接推广到多人、多产品、多因素的情形中去，详见下述。

交换效率条件

交换效率定义为：对于一定量的产出物品 X 和 Y ，当在 A 和 B 之间的分配达到以下状态——不使另外一方处境变糟的情况下使 A 或 B 处境变好——的 X 和 Y 的再分配是不存在的，则此时的交换是有效率的。因此交换

效率条件通过把一定的可获得的 X 和 Y 当成人为给定，而独立于经济的生产过程之外。可以不考虑经济的生产状况而应用这些条件。它们仅仅保证当一定量的产出 X 和 Y 生产出来后可在 A 和 B 之间有效地分配并达到最优，在更一般的情况中，不论有多少物品产出，它们都可以在众多消费者间被有效地配置。

如图 2-1 所示，可以构建埃奇沃思盒状图来说明交换效率条件的导出及竞争性市场的最优条件。此图显示了在 A 和 B 之间 X 和 Y 的所有可能配置（假定 X 或 Y 没有被浪费）。沿水平轴和垂直轴 $O_A X$ 和 $O_A Y$ 的距离代表了经济中可获得的 X 和 Y 的数量。 $O_A Y O_B X$ 盒中的任一点都代表了在 A 和 B 之间 X 和 Y 的潜在分配，这里沿原点 O_A 的东北方向标示 A 的分配，沿 O_B 的西南方向标示 B 的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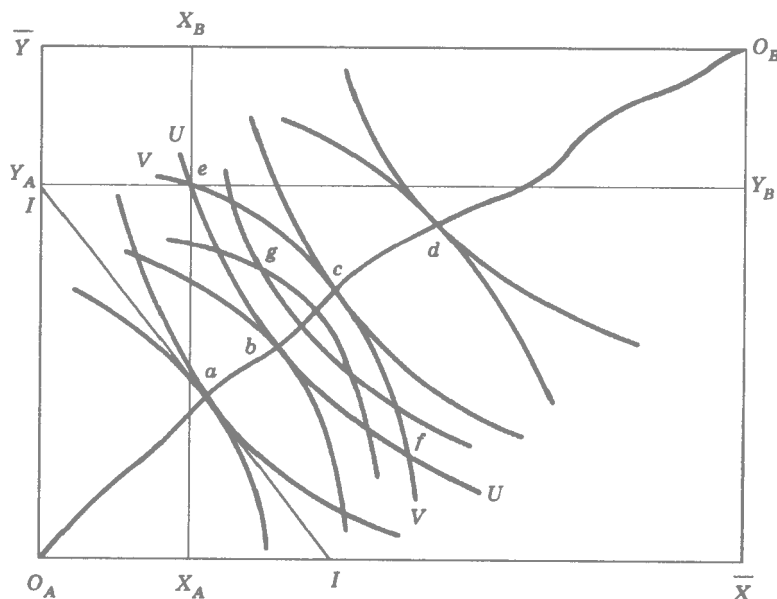


图 2-1

举例来说，考虑点 e 。使用原点 O_A ， e 代表了个体 A 的分配 X_A 和 Y_A 。同样地，从原点 O_B 起算，则 B 获得 X_B 和 Y_B ，并且 $X_A + X_B = X$ 以及 $Y_A + Y_B = Y$ ，代表了整体可获得的数量。以此类推，盒中的任意一点都代表了 X 与 Y 在 A 和 B 之间特定的分配。我们的任务是发现哪一点能满足交换效率条件。

显示交换效率需要判别个体在何时“变好”或“变糟”。假定每一个人都能最清楚地判定自身的福利状况，正如对 X 和 Y 的偏好所显示的那样。则可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严格界定的偏好，而且这些偏好可通过一组无差异曲线来表示。一条无差异曲线，比如个体 A 的 UU 和个体 B 的 VV ，代表个体对于 X 和 Y 无差异的一个组合。即 A 对埃奇沃思盒中的 e 点和 b 点是无差异的。对于 A 来说，相对于 UU 上的点，更偏好所有位于 VV 东北方向上

的点(使 A 变得更好)相对于所有在 vv 西南方向上的点则更偏好 uu 上的点。以 B 的原点 O_B 标示的 vv 具有同样的特性。通过盒中的任意一点都可画出每个个体的一条无差异曲线,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偏好的顺序来排列对于 A 和 B 的所有可能分配。无差异曲线上任一点的斜率表示为恰好补偿个体的 X 的少量减少而给予其 Y 的数量,这使其保持了变动之前的效用。此斜率称为 Y 对于 X 的边际替代率,用 MRS_{XY}^A 表示 A 的 Y 对 X 的边际替代率,同理 MRS_{XY}^B 则表示 B 的 Y 对 X 的边际替代率。^⑤见图 2-2,此图显示了典型个体的一条无差异曲线, q 点的斜率即是 q 点的边际替代率 MRS_{XY} ,表示了恰好平衡 Y 增加 ΔY 带来的效用变化而必须放弃的 X 的数量 (ΔX)。假设 MU_X 为 X 对个人的边际效用。它表示 X 的每单位变动带来的效用变化(仍假定为“可衡量的”)。 X 的少量变动 ΔX 所带来的总效用变化为 $MU_X \cdot \Delta X$ 。同样地, MU_Y 是 Y 的边际效用。 Y 的少量变动 ΔY 所带来的总效用变化为 $MU_Y \cdot \Delta Y$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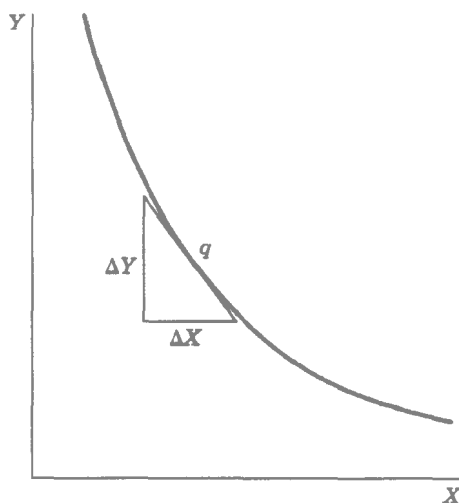


图 2-2

由于个人的效用水平在变动前后应保持不变,因此由 ΔX 和 ΔY 各自带来的效用变动应能相互抵消:即 $MU_X \cdot \Delta X = MU_Y \cdot \Delta Y$ 。由于已经定义了 $\Delta Y / \Delta X$ 为 MRS_{XY} ,故有:

$$\frac{MU_X}{MU_Y} = MRS_{XY} \quad (2-1)$$

无差异曲线族或偏好顺序有两个重要特性。首先,无差异曲线族并不能衡量 x 和 y 的不同配置的效用水平,而只能排出其顺序。我们可以说对 A 而言,偏好 e 点甚于 a 点,因为 e 点在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上,但是我们说不出究竟偏好到什么程度。沿原点可以人为地按顺序给无差异曲线标上数字,但这些数字仅仅为了显示曲线的顺序,而不是其数量。出于这样的目的,无差异曲线就是依个人偏好按人为标定数量排列顺序的图示。效率条件的表示也无须衡量效用水平。效用被假定为是序数现象而不是基数现象[对于“可

衡量性”详细的论述，见阿尔钦（Alchian, 1953】。然而，选择使用数学模型体现无差异曲线表达的信息是可能的并经常是很便利的。这样，我们假定可以效用函数来表示一个家庭的偏好：

$$U = U(X, Y)$$

该模型表示任何在特定的消费点（ X, Y ）所获得的效用水平的量化。同样道理，数学模型中较大的数字表示了较高的效用水平。

无差异曲线的第二个假定特性是它们相对于原点是凸的。即个体偏好有这样的特性：随着个体获得越来越多的 X 和越来越少的 Y ， Y 对 X 的边际替代率逐渐减少。随着个体拥有更多的 X 和更少的 Y ，则相比边际单位 Y ，边际单位 X 所含有的效用越来越小。这种关于个体偏好的假说通常是站得住脚的，但对一些特殊的状况则不适用。^⑥对于建立竞争性价格机制的效率，这个特性是至关重要的。

从图 2-1 中显然可以看出 e 点并不满足交换效率条件的定义。从无差异曲线的特性来看，相比 e 点， A 和 B 都更偏好凸透镜图形 $ebfc$ 中的任意一点。从 e 点到凸透镜内一点如 g 点的 X 和 Y 的重新配置将 A 和 B 置于比 UU 和 VV 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上，使他们的处境都获得了改善。同样 g 点也不是交换效率点，因为有无差异曲线在此处交叉，又构成了一个凸透镜图形，更进一步的重新配置将使 A 和 B 的处境都变得更好。因此盒中的交换效率点是无差异曲线不在其上相交的那些点，即那些 A 和 B 的无差异曲线相切的点。 a, b, c ，以及 d 点都是交换有效的，因为无法找到 $\bar{X}$ 和 $\bar{Y}$ 的另外的配置，使一个体境况变得更好，又不使另一个体境况变得更糟。这些点的共同条件是两个无差异曲线在其上斜率是相等的，或者：

$$MRS_{XY}^A = MRS_{XY}^B \quad (2-2)$$

在多物品和多个体的一般情况中，交换效率条件要求对于所有个体而言，在所有物品间的 MRS 都是相等的，即：

$$MRS_{ij}^h = MRS_{ij}^k \quad (2-3)$$

h, k 指所有个体， i, j 指所有物品。

在图 2-1 中，在 A 和 B 的无差异曲线之间的所有切点可连成一条从 O_A 到 O_B 的线，称为埃奇沃思盒状图的契约曲线。因为按契约曲线上的任意一点都满足交换效率条件，原则上就有众多交换有效的配置。如果物品 X 和 Y 可无限分割，则对于经济中产出的给定数量的 X 和 Y ，就有无穷个数的有效率配置。每个点和其余点的区别在于或者 A 的境况变好 B 的境况变糟，或者 B 的境况变好 A 的境况变糟。图 2-3 的效用可能性曲线可表示同样的状况。假定 A 和 B 的无差异曲线可按一些人为规定用数量表示，其特征是较高的无差异曲线用较大的数字表示，则图 2-3 的效用可能性曲线代表了图 2-1 中 A 和 B 沿契约曲线可获得的量化的效用水平组合。它的特征是向右下方倾斜，但其形状依赖于排列效用水平 U^A 和 U^B 大小顺序的人为量化规定。在图中也显示了点 a, b, c, d, e, f 和 g 。